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学术主持人:乔瑞金)·

文化唯物主义技术批判的底层逻辑研究

乔瑞金 乔 沙

[摘要] 文化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技术批判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技术、工业与人的本质内在一致且技术本性“善”的思想,认为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所依赖的根本性力量,然而,背离技术本质的资本主义运用给人的现实生活 and 人类文明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文化唯物主义对技术重商主义、技术独断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等资本主义价值观作出了系统批判,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技术价值观回归对技术本真存在的认识,从根本上改变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的现实,使技术造福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

[关键词] 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技术批判

[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4]12-0074-08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4.12.021

20世纪堪称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的时代,它深刻影响了自那时以来人类理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and 人类的实践活动,在技术创新、技术开发以及技术运用方面,形成了许多国际规范和规约,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与之相伴随,技术批判作为近百年来人类理智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世界性的学术思想画面。对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展开深入批判,不仅深化了人类对技术体系、工业生产体系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本质的理解,而且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各种异化现象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展现出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和人自我完善的方式,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模式、评判标准、价值目标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特征的理性把握。其中,文化唯物主义作为20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在充分肯定技术作为文化表现形式的“善”的本质的基点上,展开了对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的“恶”的异化表现及其灾难性后果的批判,尝试在价值论层面阐释技术的社会主义运用的理性价值和“善本”的意义。本文尝试分析文化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技术运用的“恶”的表现形式及其实质的批判,揭示其底层逻辑,探讨其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性力量

文化唯物主义是20世纪中叶英国新左派运动中产生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潮。面对风起云涌的信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日趋激烈的内在矛盾,文化唯物主义开展了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批判。它深刻认识到,现实的人类文明发展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重大主题,即战争与和平、帝国霸权、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深远影响、自由民主的前景以及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这五个方面的问题“由两项紧密相关的发展所主导:一是人类借由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来改变地球的能力变得无比强大且持续加速提高;二是全球化”^①。这两种主导性力量对现实的世界政治和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其中新科技革命尤其是新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所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技术批判构成了文化唯物主

作者简介:乔瑞金,男,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乔 沙,女,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批判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23&ZD017)的阶段性成果。

①[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吴莉君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切入点和主要形式。

首先,技术是以“实用技艺”“应用事物”、方法体系以及与生产活动内在关联的形式存在的。文化唯物主义充分肯定技术在当代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根本性作用,秉持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从人道主义视角审视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它认同法国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在《技术与社会》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社会中,“现代技术已经构成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背景,因此,无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思想的研究,都必然会涉及技术,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①。现代社会是技术社会,它提供了一个场域,规约着人类的各种活动和行为。在接受现代社会是技术社会基本主张的同时,文化唯物主义尝试对技术的本真存在及其价值和意义作出哲学本体论的阐释,它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技术、工业与人的本质内在一致的思想入手,认为技术作为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文化品格是一种“善”的本质存在,具有“善”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从人类文明和人的自我发展的视角审视技术的社会价值,揭示技术存在的本质内涵,最早是在技术哲学的工程学学术传统中完成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在1877年出版的《技术哲学纲要》中用作为工具的技术的发展历程来解释人类文化的演进历史,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改善工具的历史,他把技术当作“创造的再开始”,把技术行为看作人的“器官投影”,即技术是人体器官的结构与功能在外界的投射,工具和人体器官之间的形状、结构和功能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即映射或投影关系,试图从人类学以及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解释技术^②,主张技术是“自然的人化”,是提高人改造自然对象能力的表现。文化唯物主义并不完全认同传统工程学关于技术的定义,认为这一定义虽然看到了技术在扩展人体器官功能和提高人改造自然对象能力方面的作用,但只是把技术限定在个体的“技艺”方面,既缺乏对其人道意义的把握,又缺乏从人类生产资料生产的高度对技术内涵的理解。文化唯物主义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理解技术的本质,认为技术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在17世纪,技术或者是描述某一种特殊的技艺,或者是描述对技艺的系统研究。在18世纪初期,技术的基本定义中除了对技艺的描述外,更多的是对机械的描述。到19世纪中叶,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专指“实用技艺”“应用事物”以及技术或方法的体系,其与科学存在明确的区别。^③这样,文化唯物主义就把技术与人的现实活动内在统一起来,与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统一起来,尤其突出了它的应用性、作为生产体系的存在以及促进人的生活方式变化的特质。^④

其次,文化唯物主义把作为“生产体系”和促进人的生活方式变化的技术看作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整体表现。在文化唯物主义看来,作为“生产体系”和促进人的生活方式变革的技术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在工业革命中与生产活动的内在关联使传统技术的内涵与作为一般技巧的技术有了根本的不同,从而使技术成为工业生产的代名词,成为人类现实的实践形式,其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也在工业生产中得以充分体现,表明技术是与价值判断密切关联的。它不仅体现了工业生产的能力,即人类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而且标志着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这就使技术的价值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与技术、工业生产的本质内在一致的思想统一起来,赋予技术以人类文化构成核心要素的特征,因为文化是人类的整体生活方式,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确立了技术即工业的本质的思想”^⑥,认为“全部人的

^①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Order," in Carl Mitcham and Robert Mackey (eds.),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p.86.

^②参见乔瑞金等:《技术哲学教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③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84页。

^④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页。

^⑤参见[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4页。

^⑥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①。技术作为文化是人的基本存在形式,同人的本质完全结合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②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工业和商业,而共产主义也“必须依靠工业的进步和发展”^③才能实现。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不断增强的生产能力,人类具有了愈来愈强大的改造自然和构建人工自然的能力,以此提高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作为生产体系和促进人的生活方式变革的“善”的本质得到充分体现,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巨大进步。

在文化唯物主义看来,技术的创造或发明是人类特有的创新能力和形式,所有技术研究都是在“早已存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形式”的基础上进行的。^④从这个意义上说,它首先是人类理智的创造,是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的发明和创新,是人的肢体和大脑功能的延伸。然而,如果一种新发明的技术被人们挑选出来运用于生产活动或者作为资本投资时,或者当人们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时,甚或当它从作为一种技术发明转向可以恰当地称为可以得到的“技术”时,其普遍的社会意义就凸显出来了。^⑤这就是说,技术本身是有益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具有“善”的本质规定性。技术进步本身表征着人类理智的进步,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基本手段,是人们在“早已存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形式之内”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就此而言,文化唯物主义关于技术本质的理解是关涉价值的,是人类“善”的行为和实践活动的表现。这是文化唯物主义关于技术本质最基本的认识和判断。

再次,技术作为生产体系和促进人的生活方式变革的手段体现出其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善”的本质。当文化唯物主义把技术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历史活动、道德活动以及人自身的解放内在地统一起来,并结合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和人类文明的发展,阐释技术作为文化的原本意义,从而赋予技术以“善”的本质时,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善的本质”存在的预设,为技术的社会运用奠定了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提供了基本的理性评价尺度和标准,从而奠定了在有利于人存在和发展的整体话语体系中把握技术与人类活动内在统一理念的基础。文化唯物主义的早期代表霍布斯鲍姆说:“工业革命标志着有文字记录以来世界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人类生活转型。”^⑥文化唯物主义把文化看作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技术和工业则是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的根本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护身符”,是促进人类幸福和自我完善的根本动力。

二、背离技术本质的社会运用造成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虽然技术具有“善”的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的社会运用总是表现为“善”的或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事实上,机器、技术与工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运用和发展,尽管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发展,但也带来了普遍的人的异化和社会异化,给人类的现实生活带来了诸多灾难和问题。文化唯物主义继承马克思从技术和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入手展开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和做法,结合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不恰当运用带来的恶果,并把它归结为技术重商主义、技术独断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指出正是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导致了技术的发明、创造和运用与技术的“善”的本质发生矛盾,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

③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④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2页。

⑤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2页。

⑥[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同时也造成了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要发挥技术的“善”的价值,就必须从社会制度层面探寻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引导人类走出现实困境。

(一)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凸显利益至上、技术垄断和政治霸权三个目的,表现为重商主义、独断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价值取向

技术重商主义的人格分离彻底颠覆了人类的文化基础。在文化唯物主义看来,为追求最大化商业利益的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构成了人类现实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威胁。虽然把技术运用于商业不是资本主义的独创,但是,不择手段地利用技术获取最大化利益是资本主义的本性,甚至把技术的赢利功能发挥到极致,把一切技术的价值都放在商业利益的天平上衡量,而不考虑其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和聚敛主导了整个经济,甚至是全部生活”^①。因此,在追求最大化商业利益的价值观驱使下,发展技术的直接目的与技术反映的人的本质属性完全背离,技术仅仅成了谋取最大私利的工具。

技术独断主义导致经济社会萧条和社会秩序混乱。文化唯物主义的技术批判把技术重商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基础,这种价值基础内涵于新自由主义的主导理念之中,体现了现代主义的一般哲学特征。现代主义的实质是对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各种复杂后果的回应,在那种秩序中,帝国的政治权力与法人的经济权力在毁灭传统社群的同时,造成了真实的和象征性的权力与资本在都市的集中,其后果就是典型的“商业主义”和所谓“民主”形式,以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广泛传播。新技术借助电影、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传媒手段,不断强化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从而形成了以技术独断性为特征的权力辐射和资本对社会行为的制约,造成了文化同质化的各种条件,最终形成了普遍化的“通俗文化”。正是在同质化的“通俗文化”影响下,被改变的甚至错位的人性成了被认可的“正常状态”^②。

技术霸权主义打造了唯我独尊的“民主”按钮和国际强权政治。新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广泛运用,使得技术霸权主义政治成为可能。文化唯物主义认为,一方面,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政治以更加强权的形式被普及和“拥戴”,因为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运行过程中,统治者借助新技术掌握的各种信息和数据具有很大程度的虚假性,数据的提供者与使用者的关系是失衡的,如经过挑选的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其实是被预先选择的,因此,公众在没有权限的终端面前,所能做的只是按下这个或那个按钮,以此塑造出貌似公正的资本主义民主;另一方面,技术和工业也打造了强权政治和世界霸权,资本主义强权国家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会以极其残忍的野蛮手段去猎捕自己的目的,这就是 20 世纪留给我们的遗产”^③。

在文化唯物主义看来,各种新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构成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威胁,特别是技术运用的“恶”的社会后果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常态。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形式,而且具有确定性的内容;不仅颠覆了人类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而且压制了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在工业化社会中,作为文化的一种基本形式,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受到三个因素或三个目的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或目的不是源自技术本身,而是源自现实社会秩序和社会境况。^④ 具体来说,首先,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是研发企业(有时也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研发计划并组织实施,在创新技术基础上开发新产品从而开辟新市场,实现低成本、高赢利的目的。其次,技术开发本身包含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意图,即将新技术的运用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再次,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包含强烈的政治意

①[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3 页。

②[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188 页。

③[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看 21 世纪》,吴莉君译,中信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 页。

④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174 页。

图,即试图把新技术渗透到“政治上”封闭的各个地区,渗透到相关的政治垄断集团。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这里所说的第一个目的主要是指商业目的,而不是与发展文化的意图相联系。企业、科研机构 and 政府部门联手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本来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但在资本主义现实状况下,由于运用技术追求利益最大化,致使技术开发者与相关经济组织和政府机构密切协调,往往形成政企勾结、政商勾结的利益团体,这不仅容易造成市场垄断,而且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规则。第二个目的本身表现为技术垄断,虽然技术垄断包含了赢利目的,但它更是为了社会控制,由控制人们的物质生活到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导致人的自由存在和个性发展成为一句空话。第三个目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具有更本质的意义,那就是借助技术的开发运用强化霸权政治,由经济上的赢利扩展到政治上的统治,这一过程已经完全超出了技术的范围,使技术本身最终变成了政治的奴仆。

(二) 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导致了普遍的社会灾难

从上述对技术运用的三个目的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开发和 innovation 对于资本家、科学技术领域的从业者、公司企业以及政府来说,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某种新技术的必然的或不可阻挡的开发与运用,都是与赢利目标、社会控制以及政治霸权密切相关的,是与各种公开的或者隐蔽的商业目的相一致的,是伴随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的先行考量成为技术发展的根本尺度,紧随其后的则是文化上的侵袭和对人的行为和生活的全面的深层的控制,文化所携带的理念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它打破了现存的“民族文化界限、商业界限、国家权力界限、企业与公司的界限”^①,进而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甚至整个世界。事实上,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惜代价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的典型表现,正如文化唯物主义所看到的那样,正是追逐利益的根本目的带来了一系列“恶”的文化后果,这种后果主要表现为文化灾难、文化威胁、文化反差、文化服务、文化转移、文化垄断、文化控制以及文化领导权等等,表明技术发展作为一种实质性的创新活动,“已经同文化垄断和控制的各种新旧形式结合起来了”^②。

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运用的三个目的的实现过程极其复杂。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在技术运用的三个目的的共同作用和引导下,几乎所有的个人、团体、组织以及整个社会,都弥漫在自私自利、争夺社会权利和物欲横流的境况之中,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异化的社会,这种异化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充分表现出来。

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国家统治形式是所谓普选制度。在这一领域,始终表现为把最新的一切技术手段运用到选举程序中,各种政治势力利用技术手段,在安排访谈、征集选举意见、模拟投票等活动中,根据事先设定好的条件和回答问题的权限安排议程,把商业市场和选举过程结合在一起,通过操纵大众的心理和需求进行提问和质询,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修改各种问题以及对问题的重新阐述,提出各种替代方案,引导大众的思考和行为,从而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奠定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参与民主是一种代表决策制度,贯穿着全程投票方式,因而它抹平了人们认识上的真正差别,固定了选择的范围,借助技术手段进行政治诱导性活动,美其名曰征求“公众意见”,但实际上是政治集团的“意见”,是把控制者的愿望转化为公众的意见,从而使资本主义的霸权在社会运动过程中成为可能。

在经济和商业领域,创新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使一切都归结到金钱上。金钱发挥作用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各种形式的资本投入如商业赞助、信誉担保、慈善捐赠、独立投资等的目的都在于获取高额

①[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5—176页。

②[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7页。

利润,甚至政府直接介入,把一部分税收引向那些高回报的领域,形成所谓“商业文化”。文化唯物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至上的意识形态叙事直接影响了政治决策和文化发展的方向,直接导致了人格分裂、身份丧失、人类交流基础的错位,把人类的机能不全、自我欺骗、扮演角色、个人在临时关系中的错位和替换乃至在非交流情况下不诚实的交流悖论,当作自证的常规论据。^①技术运用的重商性、独断性和霸权性导致了人们心理的异化,人们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成为追逐私利的和破坏性的(re-relationship as inherently self-seeking and destructive)。天生的竞争性的暴力,历史的无意义,一切行为的虚构性,语言的任意性等艺术和生活形式的变异,使人的残存的自尊荡然无存。^②

在军事领域,打着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幌子,对高新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从来没有停止过,投资(包括公开的和隐蔽的)规模更是惊人。许多尖端技术领域几乎都有军方的影子,例如卫星技术,最初完全依赖军用火箭及其相关的通信和侦察系统而展开研究,目的是满足军事需要。随着技术逐步成熟并具有推广运用的可能,许多技术就转移到拥有巨大资本的财团手里,向民用和商业方向发展,大财团与军事部门以及政府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勾连,构成了庞大的利益群体。结果就是政府投资转变为私人资本,形成能够左右国家政治和经济走向的力量,背离了为大众、为社会文明发展服务的根本宗旨。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那些在文化上持激进观点的知识分子更是以多重面孔参与新技术的研发过程。他们一方面大谈新技术的危害性,甚至以各种形式论证和阐释这种危害性,把自己打扮成新技术的批判者和抵制者;另一方面又秉持技术决定论的思想理念,明里暗里与资本密切勾连,借助新技术手段,迅速占领新技术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在市场上十分自信地谈论他们开发的“产品”的价值和市场发展规划,与各种供货公司、专家代理人机构既相互协调又展开斗争,最终达成默契,迅速占领市场,从而获取丰厚的利益。

文化艺术领域的实际情况更加糟糕。文化唯物主义认为,资本资助的文化的强大压力构成文化悲观主义最主要的来源,并在理论上形成一种坚决拒绝任何真正可以选择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主张,在坚决反对民主或社会主义的各种新形式方面也是这样,从而实际上维护了拥有特权的社会机构的存在条件,排斥了技术与作为整体的现存社会秩序之间的有效结合,使一切良好的社会秩序都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则的侵害,使人陷入技术悲观主义的情绪之中。^③

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技术运用的三个目的的共同作用下,文化艺术实际上进入了独断主义统治的时代,文化生产基本上由几家垄断性的大公司和一批所谓都市知识分子精英支配,这些公司和精英通过最新的技术手段制作和生产文化艺术产品,形成“普遍”的文化生产范式 and 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从而支配着人的文化生活、艺术生活和知识生活。由于这种支配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因此不仅造成了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同质化,而且造成了文化理论的同质化,更为严重的是把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其中,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资本主义的统治,维护资本主义的主导秩序,赋予技术自身原本没有的理论和实践内涵。

(三) 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轨道

面对普遍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唯物主义认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同时从属于两种关系的加强:这两种关系都是无法忍受的,一种是经济剥削关系的加强,另一种是政治压迫关系的加强。雇主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少人情味”^④。

^①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6页。

^②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6页。

^③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9页。

^④[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事实上,按照文化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充斥于任何与人类生存和生活相关联的领域,甚至在“公共服务系统”中新技术的运用也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提供服务的传统意义被彻底消解了,“商业系统为劳动者提供各种重要机会的同时,彻底改变着与其连在一起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①。除此之外,在教育、人口、医疗和养老等方面,商业目的、控制目的和实现霸权目的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的技术发明创造背离技术本质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对技术发明创造的空前重视大大推进了技术开发的速度,许多人们从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技术似乎在一夜之间被开发出来,并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在超乎想象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现实状况。显然,由于技术本身具有“善”的内在本质,因此,毫无疑问,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然而,问题本身不在于技术的开发和运用,而在于这种开发和运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在文化唯物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以最大的力量开发和运用技术,是在实现技术运用的三个目的,是在“坚决地凸显以美国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模式,创造并扩大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的新需求,借助掌握着各种新核心技术的公司来确认这些技术,并用跨国超级资本主义新的灾难性的形式来推广和运用新技术,与有特权的和家长式统治的机构的捍卫者们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通过教育途径,把美国价值观扩大到全体民众,获取暴利,从而形成了技术决定论与文化悲观主义的一种可怕的结合”^②。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即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已经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轨道。

三、回归技术的人道本原,构建人类文明新秩序

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文化唯物主义发出了“拯救社会”的呼吁。但其仅仅试图在技术批判中找寻出路,力求使技术的运用回归人道本原,从而构建人类文明新秩序。那么,如何才能使技术回归其“人道本原”,展现技术“善”的本质呢?如何克服技术的资本主义滥用呢?文化唯物主义揭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底层逻辑。

首先,技术属于所有的人,因此,技术的任何形式的社会运用都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新开发的技术首先属于开发者,因此,需要建立一套监控技术运用的机制,这是技术运用的逻辑基础。技术发明的意义得到显示,主要得力于人们对它的挑选、投资和促进其发展,这一过程是一般的社会过程和经济过程,是在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之内,也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秩序之内展开的。技术的挑选、投资和运用是“为了特定的用途和利益而设计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化唯物主义强调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必须有利于提高人类的福祉,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技术是人控制和物化自然对象能力的表现,具有人道的本质属性,任何技术的运用都必须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但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产生了巨大恶果。人类必须认识到,并不是技术发明导致了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变化,而是在新发明本身的现存形式和可能性之内发展出了新的替代性的系统性技术,并把它运用于各种产业和文化系统中时,技术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凸显出来。新技术的运用具有复杂性和开放性,而且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得原本“无法接近”的领域变成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意义的领域。^③这就是说,必须对技术的社会运用给予控制,构建基于对技术“善”的本质的文化认同的情感结构,构建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新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必须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权利意识和斗争意识,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关于技术本质的观念,形成有利

①[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9页。

②[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1页。

③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4页。

于人类发展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场域,构建新的社会秩序,消除技术异化,使技术真正发挥改变和改善人的生活方式的作用,使人们能够享受技术带来的幸福和快乐,使技术的运用回归“善”的本质。

最后,只有把技术运用的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彻底铲除技术重商主义、技术独断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带来的恶果。因此,在技术的研发和运用中体现人道主义的价值旨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保证实现技术运用的上述目标。对此,文化唯物主义以及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如何在资本主义的现实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作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形成了诸多新的思想和理念。

四、结语

文化唯物主义技术批判的底层逻辑,以技术本质的“善”体现其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尤其是其改变和改善人的生活方式的意义。从技术价值观的发展来看,人类对技术价值判断的最早也是最基本的观念是技术乐观主义,即认为技术作为人类肢体的延伸极大地扩展了人身体的功能,提高了人类改造对象世界的的能力,因而它只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快乐,不会造成任何灾难。文化唯物主义秉承这种最基本的技术价值观,并把它发展成关于技术的唯物主义的“善”的哲学价值观,从而确立了其技术批判的底层逻辑的基础和核心理念。然而,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强烈地表现为技术重商主义、技术独断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这些价值理念及其引导下的技术开发和运用,使得技术价值由单一价值判断转化为二元价值存在,即既改变和改善了人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文化唯物主义从技术价值的“善”的本质的一元判断出发,对技术重商主义、技术独断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的价值观作出了深刻的理性阐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恶”的本性。在文化唯物主义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源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技术得到了巨大发展,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各种新的积极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可能性”^①,但如果技术的运用只是为了实现技术重商主义、技术独断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的价值目标,那么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恶”要远远大于“善”。因此,必须对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作出深刻批判,通过提高大众的“善”的社会意识,发展社会民主,激发微观革命,促进工人阶级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方式,使技术真正助力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

(责任编辑:周文升)

^① [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8页。